

(学会内部交流，非卖品)

# 胡适研究通讯

2010年第4期(总第12期)



胡适研究会编

2010年11月25日

## 目 录

《重新发现胡适》自序.....	耿云志 (1)
胡适、赵元任与《四部丛刊》 .....	邹新明 (4)
全面介入五四爱国运动的胡适 .....	张德旺 (8)
胡适的死 .....	(日) 目加田诚著 石立善译 (19)
犹太神学院院长与胡适 .....	陈毓贤 (22)
胡适与西安有关联的一件事 .....	苏育生 (23)
胡适的最后一篇日记 .....	段怀清 (28)

# 《重新发现胡适》自序

耿云志

一

人生世上，会碰到许多机缘，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发生重大影响，并且往往都是原来所无法预见的。

我在小学、初中时期，曾经对文学有很大的兴趣，未尝没做过当作家、当诗人的梦。可是升高中的第一学期，我初中时特别要好的一位同学为我买了一本刚刚出版的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当时只出了第一卷），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我利用寒假时间很认真地读了这本书。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思想和知识的新世界。从此，我对哲学的兴趣大大超过了文学的兴趣，也决定了我在大学里选择哲学专业。但临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又偏偏被选录到近代史研究所来工作。经历几次下乡搞“四清”和劳动锻炼，又经历几年的文革动乱和两年多的干校生活，在大家都惶惶然，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我们竟然得天独厚地有机会开始做“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工作。

民国史的研究工作开始于 1972 年秋，当时分作三部分展开：一部分人做人物研究，从撰写民国人物小传做起；一部分人准备编写民国大事记；再一部分人搜集编辑专题资料。我参加人物研究，且主要致力于思想文化方面的人物。这些，很大程度上都可说是命运的安排。

研究民国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人物，不能不特别注意到胡适。他是民国时期教育、思想、学术与文化方面最耀眼的领军人物。国民党方面这样看，共产党方面更是这样看，不然就不会发动那样大规模的批判胡适的运动了。但我对胡适其人原来知之甚少。在大学里讲中国现代哲学思想时，任课的老师只能根据大批判的材料，对胡适再来一番批判。胡适本人的著作我们是无法见到的。现在，在民国史研究的大题目下，研究胡适就决不能依赖原有那些大批判的材料了。凑巧的是，民国时期出版的胡适的著作的大部分，甚至一部分台湾出版的胡适的著作，我们研究所的图书馆里都有。而更重要的是，原来胡适自己收存的档案资料也都保存在我们的图书馆里。所以，我要了解一个真胡适，是具备比较好的客观条件的。这使我终于下决心对胡适做一番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即使没有机会发表研究的成果，也值得这样做。1975 年，我花了将近十个月的时间，把胡适档案翻了一遍。我的头脑中开始形成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大批判运动所塑造出来的胡适形象。于是，我又重新阅读胡适的著作，从而对他的思想，他的活动，他的人际关

系，以及相关的时代与社会背景，都有了比较深入和全面的认识。但我感到还没有机会把我的认识发表出来。在《中华民国史资料从稿·人物传记》的第五辑里，我写的胡适小传，还只能说到他对文学革命的贡献。直到1978年底，读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之后，我才决定为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举办的学术讨论会，写一篇关于胡适的文章。这就是发表在1979年5月号的《历史研究》杂志上的那篇文章（《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的由来。

因为胡适这个人物太重要了，他曾经发生的影响太大了。而那场对他的大批判，又从反面加大了他的影响。所以，研究胡适的文章，就格外引人注目。我也因此与胡适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 二

这本书一共选录我过去三十年里，先后发表的研究胡适的文章三十四篇，加上附录的两篇，是三十六篇。虽然不是全部，但大体上可以反映出我的研究的基本轨迹。

书中所收最早的一篇论文是《博士学位问题及其他》。此文纯是因兴趣而起，当时就没想到要发表。尽管如此，文中还是谈及胡适的政治态度方面，说他“为了反对革命而与反动统治集团相结合”。以后几年所发表的论文中，差不多都还有这一类的提法。记得前些年有人在网上发表议论说，“耿云志进步了。从前发表的文章，还认为胡适反动，后来的文章不这样说了”。他的评论没有错，但只是他不了解我们这些从7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胡适的学人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记得，1979年，黎澍先生和我，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达成协议，由我校订《胡适文存》（一、二、三集）交该出版社重新排印出版。我的工作已完成过半，忽然听说，某一位地位很高的人发话：“我们社会主义的出版社，怎么能出版胡适的东西？”。出版社不得不立刻终止这项工作。1983年，因为我搞胡适研究和立宪派研究，人家对我的论文进行审查。不过结论是，属于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1986年，又有一位学术地位很高的人，在知识界都很关心的一家大报上发表文章，批判黎澍先生和我，还是因为胡适研究（我的第一本书，《胡适研究论稿》是1985年10月出版的，黎澍为此书写序）。我举出这两件事，是想说明，第一，胡适研究不是很容易被容纳的，须有一个过程。第二，我个人对胡适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所写的文章里，对胡适的政治态度和立场，我确实认为他有点反动。后来，社会改革开放的程度逐步提高了，读的书多了，才深刻体会到，社会上、政治上许许多多的问题都不是靠革命或反动两个概念能说得清楚的。胡适多次批评过政府当局，也多次与政府当局妥

协，但他终不失为一位有独立地位的知识领袖。

研究胡适与研究任何学问、任何科学一样，都是为了揭示真相，接近真理。但真相不是一下子就被揭示无余；真理不是一下子就被穷尽的。研究者自己须有一个过程，而研究者的认识被其他人，被社会所接受，则更需要一个过程，有时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

每个民族的历史上，每个时代的社会里，人们都会遇到因某些原因而形成的种种成见，甚至偏见。一旦形成成见或偏见，它就会束缚人们的思想，影响人们实事求是地认识事物。改变成见与偏见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应理解历史的过程，没有过程就没有历史了。

三十年前，“社会主义出版社，不容许出版胡适的东西”。到今天，研究胡适的文章有上千篇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研究和谈论胡适的专书有百余种在各地出版；胡适的著述，以单行本，选集、文集、甚至全集的名义争相问世。试想想，这中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常说，在一定的意义上，胡适研究的进展，人们对胡适的认识的变化，几乎可以说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天然尺度。

回顾研究胡适的这段历史，很有启示意义。我们必须尊重历史，人们可以改变对历史的认识与解释，但不可以抹杀历史和改变历史。基于这种认识，在编选这本书时，除了作文字的校订以外，内容不做任何改动。

### 三

1979 年对于胡适研究而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间点。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刚刚在上年的 12 月发表，而定于 1979 年 5 月初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 60 周年的学术讨论会的准备工作亦渐渐启动。所以，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大学和学术机构，都有人开始写研究胡适的文章。我记得，除了向讨论会上提交的几篇研究胡适的文章（至少有四、五篇）以外，这一年，有几种学术刊物上也陆续发表了几篇研究胡适的文章。从此以后，胡适研究渐成热点。从 90 年代开始，因陆续举办几次研讨会，又有研究胡适的刊物的发行，而且，史料极其丰富的胡适档案资料整理发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42 巨册于 1994 年 12 月出版发行），对胡适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用已故的朋友唐德刚先生的话说，胡适研究几乎成了“显学”。

我觉得，过去三十年的胡适研究工作，绝大多数是属于发掘材料，澄清史实，以还胡适的本来面目。真正深入研究的工夫还做得不够。比如，胡适思想的中国传统方面的资源，我们只有大致的或很表面的了解，还不曾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与分析。对于他的思想的西方文化资源，更是缺乏研究。还有胡适在各个时期，

在各个领域都有他的一班朋友和同事，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迄今只做过少数的研究，而且并不都很深入、细致。每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都会有一个人际关系构成的“小世界”。像胡适这样有巨大和多方面影响的人，他的“小世界”比一般人的要多得多，也大得多。只有把这些“小世界”里面的内容都弄得比较清楚了，我们对他的认识，才可能渐臻于全面而真实。

现在研究胡适的人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要多得多了。特别是有一批年轻的朋友加入到胡适研究的行列，他们的热情与才干都令我们羡慕。他们一定会做出更多的成绩。

我们做胡适研究的人，除了要继续更加深入地做我们的研究工作以外，我觉得，我们还应该关注使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普通人，让他们对胡适都能有所了解。现在，较之二、三十年前，社会上对胡适有所了解的人肯定是多了。但毕竟还有不少的人，因种种原因，他们没有机会阅读我们发掘的材料和澄清的史实，他们对胡适的印象，还是五六十年代形成起来的，没有多大改变。还有些人，因种种原因，仍把胡适视为所谓“敏感”的人物。我们做历史研究的目的，首先是力求还原历史，让大家都能以平常的心态看待历史事实。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也是如此。我们并不是希望大家都把胡适看成圣人，都来称赞他。我们只是希望大家以平常心来看待他，而不必特地戴上人为地打造出来的有色眼镜来看他。历史的就该归给历史，不能让陈年的老包袱总压在我们的肩上，妨碍我们轻松地向前走。

2010年10月12日于太阳宫寓所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 胡适、赵元任与《四部丛刊》

邹新明

众所周知，胡适收藏图书的着眼点与一般藏书家迥异，他的藏书不追求珍奇稀缺，多以研究为目的，注重实用。因此，他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汇聚众多常用传统经典，挑选最好版本影印，方便实用的《四部丛刊》非常重视。其1921年5月17日的日记记载：“夜读《四部丛刊》中的《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元

人杨朝英（澹斋）编。这书共九卷，都是元人的歌曲，内中真有许多绝妙的白话诗！”<sup>①</sup>1922年8月8日又记：“理《四部丛刊》，依时代分类，打破四部的区分，颇有趣味。”<sup>②</sup>可见《四部丛刊》是胡适经常翻阅利用的一部丛书。

胡适一生三次购买《四部丛刊》初编，他在1950年4月25日的日记中交待得很清楚：“李孤帆给我寄的‘缩本《四部丛刊》初编’440册，书录一册，装船直运纽约。……此是我第三次买‘《四部丛刊》初编’，第二次买缩本。海外得此四百四十册书，真如见老朋友！”<sup>③</sup>一句“如见老朋友”足见胡适对此书的熟悉和感情。胡适第三次购买的《四部丛刊》初编，现存台北胡适纪念馆，其《书录》封面有胡适朱笔工整书写“胡适第三次买的四部丛刊初编”字样。<sup>④</sup>

胡适后两次购买的《四部丛刊》初编，都是洋装缩印本，皆因他身居海外，用书不便。这套丛书涵盖中国传统典籍，版本精良，缩印本又可节省存放空间，身受“书荒”之困的胡适自然会首先想到它。

笔者在整理北大图书馆胡适藏书，翻阅相关资料过程中发现，胡适这两次购买《四部丛刊》缩印本，都与赵元任有关，《四部丛刊》是这两位好友珍贵友谊的一个见证。

胡适1942年卸任美国大使之后，除了应邀在美各地演讲之外，开始恢复学术研究，于是身居海外的他深深体会到“书荒”的滋味。无奈之下，胡适“惦记”起好友赵元任的缩本《四部丛刊》，于是写信希望赵元任能够将此套书转让。而赵元任的慨然应允则让胡适大喜过望。他在1943年4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有两件大喜事。

(1)我前天忽然写信给元任，说，哈佛一处有三部《四部丛刊》，未免太多了；我愿出一千元美金买他的那部道林纸本《四部丛刊》。他今天写信来，竟愿意把这书让给我！我有了这部大丛书，加上我现在已有的书，我的“书荒”问题可算大半解决了！……<sup>⑤</sup>

胡适在当月19日便收到了这套书，其当天日记说：

元任兄把《四部丛刊》寄来了，今天收到。我打电报给他说：“I feel as rich as Indian Maharaja. A thousand thanks.”

《四部丛刊》（洋纸本）凡323部书，8573卷，缩印成四百四十册，原价国币二百元，出版在1936[年]十二月。

我有了这三百多种书，大致可以解决我的“书问题”了。以后所需，只

<sup>①</sup> 胡适日记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第三卷，第43页。

<sup>②</sup> 胡适日记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第三卷，第702页。

<sup>③</sup> 胡适日记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第八卷，第486页。

<sup>④</sup> 承胡适纪念馆郑凤凰小姐提供《书录》封面及题名页扫描件，特此致谢。

<sup>⑤</sup> 胡适日记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第八卷，第157页。

有《道藏》、《佛藏》与理学书耳。<sup>①</sup>

现存北大图书馆的胡适藏书中就有这套赵元任转让给胡适的缩印本《四部丛刊》初编，据笔者粗略统计，其中带有胡适批注圈划和夹有纸条等阅读痕迹的有近60册。在丛书《书录》的扉页上有胡适钢笔题记：“客中无书，蒙元任兄把这部缩本《四部丛刊》初编让给我，其恩德真不止解衣推食而已。今天他把书寄到，我打电报给他说：I feel as rich as an Indian Maharaja. A thousand thanks!一九四三，四，十九，胡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赵元任的感激和得到这套书的欣喜之情。

胡适1949年再次赴美，很快又感到参考书籍的匮乏，后悔当年把赵元任转让的《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带回国。

偶翻《胡适给赵元任的信》，其1950年5月23日的信中说：

你们四月廿八日信上说，“你房子一定，望速通知我们，有些书可以寄给你。《四部丛刊》我们又托人到北平去买了。到时直接寄给你。”这些话使我十分感激，上次写信因为报告冬秀护照问题，话太多了，所以没有来得及写出我心里的感激。

前次我一月里曾说，我看见你们（韵卿）信上说起《四部丛刊》，我当时不知道你们为我计划打算，所以我说——大概说过，记不清文字了，——“我听了特别感觉兴趣”。我的意思是说，我听说你们可以买到此书，我特别发生兴趣。在那个时候，我忽然得一个“聪明主意”。我写了一封飞机信给商务印书馆的香港工厂经理李孤帆，问他能否替我买一些香港分馆可得的书，例如缩印本《四部丛刊》。他是北大出身的，平时和我很好，所以他立即回信说，老师要买本馆书，一律六折待遇！我立即寄了二百五十元给他，他真给我寄了一部《四部丛刊》（缩本）四百四十册来。……

你们千万不要替我计划买书。如果你们已托人向北平打听，最好阻止那条路。……

你们待我太好了，我久想写信道谢，今天才得写这封信。一半也是要报告这段买书故事，但主要的是要你们知道我心里十分感谢你们的好意。……

我最荒谬的事是把纽约的书带回去丢在北平。此时到处留意，想收一些基本的参考书。<sup>②</sup>

从上引书信可知，赵元任夫妇非常关心胡适到美国后的用书问题，准备寄给他一些书，并且托人到北京为胡适打听购买《四部丛刊》，胡适对此非常感激，有“你们待我太好了”这样感慨的话。至于《四部丛刊》，胡适已托商务

<sup>①</sup> 胡适日记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第八卷，第159页。

<sup>②</sup> 赵元任给胡适的信，台北：萌芽出版社，1970，第39-41页。



印书馆香港分馆的李孤帆代为购买了初编缩印本。前文所引胡适 1950 年 4 月 25 日的日记所记即是此事。胡适在收到此书后在《书录》题名页详细写下了购买此书的前因后果：

去年十二月，我在华府，老友 Mrs. Mary Crozier 述 General Wm. Crozier 的 遗志，赠我美金二百元，要我自己挑选爱读的书作为他们的赠书。我才决心要买点有用的书，重建一个参考图书馆。一九五〇年二月，李孤帆兄替我买得这部缩本四部丛刊初编。四月廿五日运到纽约。书价乙千七百五十元港币，六折，合乙千〇五十元。运费等等共一百五十五元。其时美金合港币 6.15，故此书书价与运费（港币 1205）合美金一百九十六元。胡适。

5 月 23 日的信之后，赵元任夫妇有送给胡适一套原版《四部丛刊》之意，因此胡适在 1950 年 10 月 2 日给他们的信中说：

我上次写长信很明白的恳求，你们千万不要送我原版的《四部丛刊》，因为我已有缩本的全部了。缩本只有 440 册，最方便，最适用。（已占住一个大书架。）原版的《四部丛刊》有二千一百册，我这里绝对没有地方安放。……从种种方面想过，我只好恳求你们把这部原版《四部丛刊》留在你们的 Cragmont Ave 家里，或寄给如兰，因为“行者街 27 号”一定可以容得下。此是实在苦衷，千万请你们原谅。……因为这些情形，——并不是我舍不得这部“名人手批的”报纸印的《四部丛刊》，——我不能不恳求你们把那二千一百本的大书收回，千万不可送来增添我无法解决的困难！千万请你们原谅！你们待我的好意，我完全领受，万分感激。<sup>①</sup>

信中说赵元任夫妇要送给胡适的《四部丛刊》原版，应是相对缩印洋装本而言的大字线装本。信中有“并不是我舍不得这部‘名人手批的’报纸印的《四部丛刊》”之语，笔者据此推测，有可能是赵元任夫妇考虑到胡适要经常翻阅这套书，与他们自己的收藏备检不同，因此为了胡适阅读的方便，他们愿意用原版大字本与胡适的缩印本交换。至于赵元任夫妇这套原版的来历，有两种可能，或者是他们的旧藏，或者是上封信中提到的他们托人在北京购买的，虽然胡适写信阻止，但书已经从北京寄出。

由于赵元任夫妇给胡适的信笔者一时无从查阅，他们围绕着《四部丛刊》的轶闻佳话也只能暂止于此了。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

---

<sup>①</sup> 赵元任给胡适的信，台北：萌芽出版社，1970，第 45-46 页。

# 全面介入五四爱国运动的胡适

张德旺

关于胡适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的表现及影响，国内外有关五四运动史及胡适的论著大都语焉不详，有的还不无偏颇。<sup>①</sup>本文对此概括说明，以建立胡适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的真实形象。

## 坚决支持爱国学生

胡适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反帝救国斗争。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当天，他正在上海迎接来华讲学的老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5月7日，胡适参加了上海学生及其他各界群众在体育场举行的反对巴黎和会关于中国山东问题无理决议和声讨亲日卖国贼，声援北京学生正义斗争的国民大会及会后游行。6月3日，北京政府悍然出动大批军警，大肆拘捕走上街头进行反帝爱国宣传的学生，造成北京各监狱人满为患，不得不把北大三院辟为临时监狱拘禁学生。胡适6月4日借了一个京师警察厅的证件，去北大法科探视了被捕学生。之后，他写信给上海《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公开发表在1919年6月8日《时事新报》第2版头条，几乎占近二分之一版面。因为当时《时事新报》及全国各大报一版均全部刊登广告，所以这封信实际就是当日《时事新报》的头版头条，标题也十分醒目，全文如下：

## 北京学生受辱记 —— 大学教授胡适之先生来函

东荪先生：

今天我借得了一张“执照”(上有京师警察厅总监的印章)，走进学生第一监狱，就是北大的法科，去看看里面的情形。昨天捉进去的学生，实数只有一百七十六人，都被拘在法科大礼堂。昨晚段芝贵有令，不许外面送东西进去。后来好不容易办了许多交涉，方才送了一些被褥进去，共有三十几个铺盖。一百七十多人分用，自然不够用。今天有两个学生病倒了，一个是法文专修馆的学生，一个姓张，不知是哪一校的。昨晚大雨，天气忽然大凉，故容易受病。病倒的人被送回去了，

<sup>①</sup> 前者如李新 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彭明著《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 1989 年修订版)等，胡适的传记如白吉庵著《胡适传》(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易竹贤著《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等；后者如华岗著《五四运动史》(载《华岗选集》第二卷，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等。笔者在 1985 年第 1 期《求是学刊》发表的《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资料等不足等，也有类似不足。

警察的责任总算完了。

今天各校继续进行，自上午九时到我进去的时候，共捉去了八百多人。这八百多人分监各讲堂，不许同昨日来的学生相见。内中有清华的学生，穿着黄色操衣，精神最好；高师和俄文专修的灰色制服也狠整齐。其余的大都没有操衣，但是精神都还好。

昨天来的人听说曾吃了两顿饭。今天捉进来的学生，从上午十时到下午五时，还不曾有东西吃。我问警察，警察说有饭吃，但是来不及开饭。我想，这个饿死学生的罪名，本该让段芝贵、吴炳湘、王怀庆担任的。不过我既然看见了，实在不忍坐视，所以出来的时候，请大学里一班教职员派人去办一些面包送进去。但是人太多了，不知道能办得到吗？

英国前四、五年，妇女争参政权最激烈。有许多女子领袖，如彭克斯特夫人（Mrs Pankarst）等常常被捕。他们一进牢门，便不肯饮食。饿到三四天以后，警察着了慌，只好陪小心请他们出去。他们出去之后，吃饱了又去闹乱子。这种手段叫做 Hungr Strike。但是，这是对人道的政府说的，我们对于段芝贵一流人可不能如此做。如此做去，他们谁来睬我们呢。

昨天，北大法科有一位讲师吴宗焘，因警察用枪杆赶学生退礼堂（即是监狱），故和他们辩论起来。有一位兵官姓王，一个巴掌打去，鼻子牙齿都打出血来，经人拖住方才解开。

昨天传说，北大文科英文专门学生潘家珣、陈兆畴（都是顶好的学生），因为挺撞了王怀庆，被王怀庆送到步军统领衙门，打了十板屁股。这种传说，我本来不肯信。后来听说，王怀庆就是从前在滦州兵变的时候杀害烈士白雅如的人。我们就有几分相信了。今天我到法科访问，方才知此事不确。潘君我也见到。原来，他们挺撞吴王两人是真的。不过后来他们被送到警厅监禁了一夜，今天又送回法科监狱，打屁股是假的。古人说的好“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之。”有人说现政府行好事，国人一定不信；说现政府用非刑作种种罪恶，不但国人一说就信，全世界人也一定深信不疑的。

法科的花园中央，扎了一个大蓝布帐篷。四围都是武装的士兵，地上一排一排的都是枪架。大门外从骑河楼口到东安门桥，共扎了二十五个黄帆布的临时营幕，行人非有执照不能往来。

今天被捕的人太多了，法科竟装不下。北京各校的学生听说大学成了监狱，大家都要来尝尝这种监狱的滋味。今天各中学都出来讲演了。五点钟时，第四中学的学生三四十人被捕送来，法科已收留不下（法科连预科平日有一千学生）。那时北大理科已被军警占领，作为“学生第二监狱”。第四中学的学生就都被送到理科，监禁在第一教堂。后来陆续捉来的，也拘在此，到六点钟时，已有两百人

了。理科门外也是刀枪林立，北大寄宿舍东斋的门口，也扎起营帐了。文科门口也有武装警察把守，文科门口共扎了五个黄营帐。到了明天，大概文科一定要做“学生第三监狱”了。

以上所说，都是我眼见的事实。

## 胡适<sup>①</sup>

毋庸赘言，这封信以平实冷静的笔调，生动简洁地再现了被捕的北京各校学生以身许国，慷慨激昂的伟岸雄姿和豪迈气概，细致入微地揭露了军阀政府凶恶残暴镇压爱国师生的罪行和嘴脸，言辞间蕴涵着对爱国学生的深切关爱，对反动军阀及其爪牙的冲天义愤和极度蔑视。这对正处于五四高潮中的爱国学生及其他各界民众无疑具有强烈的震撼，感召和鼓励作用，对反动军阀政府则是沉重有力、切中要害的一击，可谓与同一期间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张东荪等大声疾呼号召广大民众奋起救国、支援学生的政论异曲同工，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段祺瑞的御用国会安福系及其爪牙为了破坏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六三”后放出北大新潮社主干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了的谣言。胡适立即同周作人、刘复、陈大齐、李大钊、钱玄同等在《晨报》上刊出联合启事，严正指出：“近来有人散布谣言，说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两君被收买去了。这种谣言本来不值一笑，因为安福系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这两位高洁的青年，不幸中国缺乏常识的人太多了，居然有人信这种谣言，居然有许多通讯社和报馆极力传播这种谣言，我们心里很不平，不能不替他们两个辩个清白。”<sup>②</sup>此启胡适签名列在最后，按当时惯例，这表明他是此启发起人及起草人。傅斯年五四当天北京学生游行的临时总指挥，罗家伦是游行中散发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起草人；这个宣言提出的“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很快风行全国，成为各界民众一致拥护的行动口号；两人还都是与《新青年》宗旨、内容、风格相同的《新潮》杂志主干。胡适为他们辟谣，实质就是再次公开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

胡适还在《每周评论》发表题为《方还与杜威夫人》的随感录，旗帜鲜明地支持杜威夫人，支持北京女高师学生的爱国行动。女高师校长方还政治态度保守，自五四运动爆发以来，一面命令职员对学生严加管束，一面通知各家长决不容许学生有罢课行为，违犯规定者一律请家长领回，宁肯将学校解散，校址交还政府。6月4日女高师全体学生第一次举行爱国游行示威，整队出发时发现前门早已上锁。国文专修科学生冯沅君第一个冲上前搬起石头砸开门上的大锁<sup>③</sup>，众多同学

<sup>①</sup> 原信无分段、标点，分段、标点为本文作者所作。

<sup>②</sup> 《晨报》1919年7月6日。

<sup>③</sup> 张衍云著：《春花秋月——中国五四女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

上前硬是把两扇大木门用肩掬摇活动，很快把两扇大门拖下来，才冲出大门。从此，揭开了北京女学生投身五四爱国运动的序幕。其后，方还请杜威夫人到校演说。但杜威夫人到校后，方还却委托某女英文教员转告，“请杜威夫人今天演讲时务必注重学生服从的紧要”。杜威夫人答她道：“请你转告方先生，我不便把全篇演说的意思一齐更换了。”实际是明确拒绝了方还。胡适尖锐指出：方还“既然怕新教育的思潮，应该用他对待女学生的办法，把大门锁了，不许杜威夫人进来岂不很妙？既让她进来了，又要请她讲‘服从的紧要’，不但丢脸，也未免太笨了。”<sup>①</sup>

拒签和约后，全国各地反帝爱国运动继续深入发展。1921年6月2日，安徽爆发了反对军阀政府侵吞教育经费的斗争。起因是1917年和1918年的财政厅尚有773 000余元的剩余<sup>②</sup>，安徽广大师生要求将其列入教育经费。6月2日晚省学联会长方乐舟等学生代表赶到省议会请愿，担任过省第一师范校长而被学生赶下台的副议长赵继椿出来，一见学生代表就下令动武。许多学生代表受伤，血流满地。其中戴文秀、汪铎钟受重伤，并被抓进议会院内关押起来。其他代表拼死夺门冲出，飞奔学联和各校报信。很快，法专、一师、六邑中学、一女师、一工、一农等七校一千多的学生队伍陆续到达省议会，如狼似虎的军警立即用刺刀、枪托、警棍凶殴学生。当晚受重伤学生三十九人，轻伤者二百零五人<sup>③</sup>，其中一师学生姜高琦伤势最重，身受七刀，颈部、腹部被刺刀捅穿，被同学抢着抬送到同仁医院抢救。省会一中学生周肇基重伤，遍体鳞伤不醒人事，仍被拖进省议会门房拘押。7月1日，姜高琦在同仁医院伤重身亡，1922年11月11日，周肇基伤发致死，夫人黄家馥亦以身殉。

胡适于6月7日“收到安庆教育界自九江、芜湖、南京来的函电”，当天就在报上公开发表了详细报道惨案起因、经过及安庆各校全体教职员通电的消息<sup>④</sup>。他还在《新青年》发表《死者》一诗：“他身上受了七处刀伤，/他微微一笑，/什么都完了！/他那曾经沸腾过的少年血，/再也不会起波澜了！”“我们脱下帽子，/恭敬这第一个死的。——/但我们不要忘记：/请愿而死，究竟是可耻的！”“我们后死的人，/尽可以为革命而死！/尽可以力战而死！/但我们希望将来/永没有第二人请愿而死！”！诗前有小序：“为安庆此次被军人刺伤而死的姜高琦作”。<sup>⑤</sup>

<sup>①</sup> 天风（胡适）：《方还与杜威夫人》，《每周评论》第29号，1919年7月6日。

<sup>②</sup>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0页。

<sup>③</sup> 据黄康华：《五四时期安庆学运情况》，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庆市委员会 安庆市修志办公室 安庆市档案馆编：《安庆文史资料》（第二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另有说重伤15人，其余受伤者五六十人，见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页。

<sup>④</sup> 这个消息全文约1200字，剪报粘贴在1921年6月7日胡适日记上，无标题、亦无报名及日期，据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3），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02---304页。

<sup>⑤</sup> 《新青年》9卷2号，1921年6月1日。笔者认为，这个日期可能有误，因为1921年7月1日，姜高琦在同仁医院伤重身亡，此诗写作当在此后。

这可谓酣畅淋漓地表达了胡适对爱国学子的深切关爱和赞赏，对残暴军阀的痛恨和蔑视。值得注意的是，所说“请愿而死，究竟是可耻的”如何理解？笔者认为，这是胡适用反语说出的应对无耻军阀政府不要抱任何一丝幻想的激切之言。因为几乎与此同时，6月3日下午，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代表和学生千余人，为教育经费向国务院请愿，在新华门铁栅外遭卫兵百余人毒打，伤者无数，北大教授马叙伦等伤势尤重。12日李大钊打电话告胡适：马叙伦在医院“自昨日起已绝粒不食，亦不进饮料”，实际是绝食抗议。胡适就在日记中说：“这是无益之举。当英国妇女参政运动实行示威时，英国政府也用严厉手段对付他们，逮捕许多人入狱，入狱之女子多实行绝粒”即绝食。“大战之后，各国政府做惯了杀人的事业，竟不怕这种夫人的把戏了，故去年爱尔兰革命领袖有绝粒而竟死于狱中者，英国政府亦不因此减少其严厉手段。何况对中国这种强盗政府呢？”联系胡适在此前后连续在《四烈士塚上的没字碑歌》、《双十节的鬼歌》诗作中呼吁“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我们应“威权也不怕，/生命也不顾，监狱作家乡，/炸弹底下来去”，“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更可以清楚看出：胡适认为不值得不应该向这个反动腐朽的政府情愿，而应该用武力把它打倒推翻。这表明，胡适与广大进步青年在坚决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专制腐败无耻上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

### 积极参与“挽蔡”斗争

5月9日，由于北京军阀政府要员的炮轰北大，解散北大等沉重压力，而且五四当天被捕的学生都已释放回校，北大校长蔡元培离京出走。军阀政府趁机大肆散布关于北大的流言，并抓紧实行派代理人控制北大的阴谋，妄图以此作为扑灭学生爱国运动的重大措施之一。广大学生针锋相对地提出“蔡校长复职”的新斗争口号。在这场斗争中，胡适坚决站在学生一边。5月13日，北大评议会和教授会召开联席会议，选出协助蔡元培委托的工科学长温宗禹维持校务的六人委员会，并严正声明：“此项组织，至蔡校长返校为止。”胡适参加了会议并被选入六人委员会，负责处理了诸如外聘教师的工作契约等事务。这在当时风云际会错综复杂的情势下对维护北大当然有重要意义。蔡元培完全信赖胡适。6月28日，蔡通过蒋梦麟表示对胡适“维持的苦衷是十分感谢的”，勉励胡适“不要着急才好”；并声明对胡适处理的一切问题“负完全责任”。<sup>①</sup>6月8日，北大学生会上书军阀政府坚决反对军阀政府派人代理北大校长，指出“蔡校长虽去，尚有工科学长温宗禹代理校务，并未僭事，今忽有命人署理事，是为拒蔡校长之来也”。

<sup>①</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9页。

表达了对主持校务的教职员的坚决支持和所做工作的充分肯定。

当军阀政府通过其爪牙收买极少数落后学生或假冒学生上条陈发宣言，制造拒蔡迎胡（胡指军阀政府拟派到北大代替蔡元培任校长的胡仁源——引者）的舆论时，胡适立即予以迎头猛击，他说：“五四以来，数目大作怪。今天一个呈子，是某某等几个几十人欢迎胡仁源做大学校长”，“明天又一个传单，是北京大学本科预科一千三百五十八个人‘揭破教员’之阴谋。数目真是作怪！”<sup>①</sup>胡适还发表《北京大学与青岛》一文，对军阀政府及其爪牙污蔑学生运动是“为蔡元培等争位置”<sup>②</sup>报以辛辣讽刺。

## 强烈抗议逮捕陈独秀

6月11日，北大新派教师领军人物、《新青年》主编、全国公认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帅陈独秀为了推进反帝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不仅以《每周评论》为阵地，坚决支持、积极指导学生运动，而且直接冲到斗争最前线，亲自起草、印刷了《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明确提出对北京政府的“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等5项“最后最低之要求”，并明确表示如不能和平达到此目的，“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sup>③</sup>这是五四爱国运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第一次提出对中国社会根本改造的斗争口号，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直接目标之上，有了进一步的更高、更全面的革命要求。陈独秀亲自奔赴位于前门外珠市口西的北京最大娱乐场之一的新世界游艺园向民众散发。当晚，陈独秀被大批军警逮捕。

胡适积极参与了这场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斗争。这个传单一页两半，左边一半是中文，右边一半是胡适翻译的英文。陈独秀被捕当晚，胡适写了著名的《威权》一诗，说，“威权坐在山顶上”，逼迫“一帮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一万多年，但奴隶们终于觉醒，同心合力把山脚底挖空。使“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sup>④</sup>实际表达了对妄图扑灭五四爱国运动烈火的军阀政府的强烈抗议和极度蔑视，对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的各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巨大作用的热情肯定。后来收入《尝试集》时，胡适又附言：“八年六月十一日夜。是夜陈独秀在北京被捕；半夜后，某报馆电话来，说东京有大罢工举动。”<sup>⑤</sup>简短附言含义深远，表明这首诗的主旨是作者从世界人民反抗强权历史大潮的时代高度，发出抗议军阀

<sup>①</sup> 天风（胡适）：《数目作怪》，《每周评论》第28号，1919年6月29日。

<sup>②</sup> 天风（胡适）：《北京大学与青岛》，《每周评论》第28号，1919年6月29日。

<sup>③</sup> 陈独秀：《北京市民宣言》，《民国日报》1919年6月14日。

<sup>④</sup> 胡适：《尝试集》，亚东图书馆1922年增订四版第60页。

<sup>⑤</sup> 胡适：《尝试集》，亚东图书馆1922年增订四版第60页。

政府逮捕陈独秀的怒吼的，道出了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反抗军阀暴政，坚信反日爱国运动必胜的心声。之后，胡适又指出：“陈独秀被捕已半个多月了，他还在警察厅里，我们要对他说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sup>①</sup>实际不仅声援陈独秀，鼓励他在狱中继续抗争，同时也是号召各界民众学习陈独秀，继续同军阀政府不懈斗争。

## 主编《每周评论》坚持斗争

陈独秀被捕后，李大钊也被迫离京去昌黎五峰山避难。胡适毅然接替陈独秀担任《每周评论》的主编，继续坚持推进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

《湘江评论》是湖南爱国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面旗帜，由湖南学联主办，毛泽东任主编。他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深刻阐述了实现全国各界民众大联合，战胜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的光辉思想，既是对“五四”以来全国革命群众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对全国人民进一步加强团结、继续奋斗的强力推进。

《民众的大联合》还明确指出了中国五四运动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密切联系，“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施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sup>②</sup>这在全国难以数计的爱国报刊中可谓慧眼独具、独步一时。《星期日》是成都学生办的宣传救国的刊物，在四川五四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胡适在《每周评论》上郑重向全国推介这两个刊物。他说：“现在新出的周刊和小日报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自广州，东自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类新兴的报纸”，“现在我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这两个周刊，形式上，精神上，都同每周评论和上海的星期评论最接近的”。“《星期日》的长处似乎是在文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的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sup>③</sup>毋庸赘言，以胡适新文化运动主将、白话文首倡者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威望，他热情洋溢的推崇大大地扩大了《湘江评论》、《星期日》在全国的影响，特别是毛泽东从此亮相全国政治舞台，迅速

<sup>①</sup> 胡适：《爱情与痛苦》，《每周评论》第28号，1919年6月29日。

<sup>②</sup>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三），《湘江评论》第4号，1919年8月4日

<sup>③</sup> 胡适：《介绍新出版物——〈建设〉、〈湘江评论〉、〈星期日〉》，《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



成为有全国影响的学生运动领袖人物之一。此后，《星期评论》发表诗歌抗议湖南军阀悍然封闭《湘江评论》<sup>①</sup>，北大新潮社主干罗家伦高度评价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文<sup>②</sup>，可能都与胡适的这些推崇不无关联。

胡适高度评价广大学生、商人和工人的“三罢”等斗争对拒签巴黎和约的决定作用。至中国代表团拒签巴黎和约前，中国代表团共收到七千余封国内来电，要求坚决拒签合约。胡适说：“现在中国专使居然不签字。将来一定有人会说这是‘电报政策’的功效。其实不然，这一次七千个电报所以能收效，全靠还有一个‘五四运动’和一个‘六五运动’，要不然，那七千个电报都只是废纸堆里的材料。”<sup>③</sup>这里“五四”运动特指5月4日爆发的北京学生运动，“六五”运动特指6月5日上海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三罢”斗争。胡适这里明确指出中国巴黎使团和强大的国内及海外爱国社会舆论固然对拒签和约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决定性因素还是国内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政治运动。应当说，这是很有见地，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胡适积极引导各界民众正确认识企图霸占中国山东并使之合法化，进而妄图独占中国的日本侵略者及其罪恶政策。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1919年8月在《建设》创刊号上发表《我的日本观》一文，结合对日本的历史、经济、政治、外交政策等的深入分析，明确指出，日本“对华的侵略政策，并不是日本的农夫工人的责任，是政治上产业上特权阶级的责任”。<sup>④</sup>该文明显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当时国内思想文化界可谓凤毛麟角。胡适对此文大加赞赏：

“本期最精彩的著作要算戴季陶先生的〈我的日本观〉。这是一篇两个万字的长文，研究日本的种种历史的势力。遗传思想的特性，经济的发展和发展的影响，政党的过去与现在，和今后日本的趋势。——材料很丰富，方法也很有系统。……我觉得季陶先生的态度与方法是很可佩服的。当这个大家恨日本，骂日本，却不懂日本的时候，他独能有这种耐性的、忠恕的、研究的态度。这不是很可佩服的吗？至于方法一层，他认定现在的日本不是一个孤立的怪现象，乃是无数历史的势力造成的产儿。……这种历史的眼光，是研究一国现状所不可缺的元素，季陶先生这篇日本的研究真可以给我们做‘觐国’文字的模范了”<sup>⑤</sup>

显而易见，这对中国人民正确认识当时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敌人是有一定帮助的。

胡适还指引学生和各界民众把斗争锋芒指向实际顽固庇护曹章陆等卖国贼，顽固坚持签署巴黎对德和约的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他抓住当时报界披露段企图

<sup>①</sup> 玄庐：《哀湘江》，《星期评论》第13号，1919年8月31日。

<sup>②</sup> 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2卷4号，1920年5月1日。

<sup>③</sup> 胡适：《七千个电报》，《每周评论》第29号。1919年7月6日

<sup>④</sup> 戴季陶：《我的日本观》，《建设》1卷1号，1919年8月。

<sup>⑤</sup> 胡适：《介绍新出版物——〈建设〉、〈湘江评论〉、〈星期日〉》，《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

收买湘系军阀程潜的事件，尖锐提出：“请问这个合肥是谁？难道是那个久已下台的合肥吗？他既不是内阁总理，又不是阁员，居然可许程潜‘勋业未可限量’，居然能‘接济湘军饷项’，这可怪了！”<sup>①</sup>当时，段祺瑞是中国最大的亲日派军阀头子，是实际控制北京政府的实力派，也是当时中国各界爱国民众千夫所指的卖国头子。西南军阀辖区的报刊对他公开的点名揭露、攻击不断，但在皖系军阀占统治地位的北方地区，却很罕见。胡适敢直呼其名抓住实证予以抨击，其意义就不止在揭露收买程潜的一件事情的真相，而是足以促使人们联想许多，特别是不难联系他对日本、对曹章陆、对巴黎对德和约的一贯态度和政策。平情而论，这是需要政治勇气的。8月30日，《每周评论》被封闭，北京政府决策过程现已很难厘清细述，但不难推断，胡适对皖系军阀这种抨击无疑是直接原因之一。

胡适在《每周评论》上用头版很大篇幅刊载杜威的讲演录《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现代教育的趋势》等，整体上对当时迅猛发展的爱国运动是有推动作用。这首先是因为杜威来华后对中国学生运动态度是极为同情，热烈支持的。5月29日下午6时，杜威在胡适等陪同下由天津到达北京，正值中国学生掀起全市罢课高潮之际。6月5日，杜威由胡适陪同，去北大三院看望了被捕学生。11日晚，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美国使馆设宴招待杜威，在京各界名流三百余人参加。席间杜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称赞“此次来京，适逢学界学潮扩大之际不能充分演说，起初不免寂寞，但现在深觉中国学生不特能教训自己，而且能教训他人，实在可以不必他多讲演了”<sup>②</sup>。这个讲话翌日被公开发表于当时最受全国各界欢迎的北京《晨报》，不啻是公开支持中国学生运动的宣言。杜威夫人应北京女子小学教员会之邀在北京女高师附属小学演讲，女高师亦有许多学生前往听讲。杜威夫人强调“现在的个人——不分男女——都能够自己自由发展自己的本身，以谋社会全体的利益”，实际不仅拒绝了方还讲“服从”的要求，而且对女学生参加救国斗争予以热情鼓励。杜威的女儿更把“六三运动”中被关押的北京学生当作英雄崇拜，给他们拍了许多照片。

其次，杜威讲演强调的是“民权的民治主义就是注意人民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类”，“社会的民治主义：就是平等主义，如打破不平等的阶级，去了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sup>③</sup>“大学代表的是光明，它反对的是黑暗；它代表真理的势力——不是遗传下来的真理势力，是由理性制成的、再由人生行为实验过的真理势力”，大学“不能不有造成舆论和指导舆论的责任”<sup>④</sup>等。显然，这种现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宣传，对中国学生

<sup>①</sup> 胡适：《合肥是谁？》，《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31日。

<sup>②</sup> 《晨报》1919年6月12日。

<sup>③</sup> 《美国之民治的发展》，袁刚 孙家祥 任丙强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sup>④</sup> 《大学与民国舆论的重要》，袁刚 孙家祥 任丙强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投身爱国运动，客观上都构成直接的极其有力的精神鼓舞和理论支撑。杜威这些讲演，适逢五四爱国运动迅猛发展之际，但每场讲演都听者（主要是青年学生）爆满，实际就反映了这种效果。胡适这期间担任了杜威讲演的绝大部分现场翻译，还发表了《实验主义》等论文，实际是积极传播了杜威的这些思想。

关于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笔者认为，这场论战并没有阻碍、破坏当时的反帝爱国运动。因为（一）双方都在五四爱国统一战线和反封建的新文化营垒之中，所以论战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营垒的内部问题；（二）就争论的内容而言，两者主要是学理之争，中心问题是用什么思想指导中国社会改造，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还是运用实验主义指导；这从根本上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但是这并不妨碍双方在现今的反帝爱国运动和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中继续合作。胡适和李大钊实际都非常注意并坚持这样做。陈独秀、蒋梦麟、毛泽东等都对这场论战极为关注，都表明了既要重视主义，又要注意中国实际问题的共同意向，实际就说明了论战的这种性质及其并不破坏当前革命群众运动的特质。

## 《尝试集》的战斗锋芒

五四爱国运动中，除前文已述的《威权》等外，胡适还有一些诗作，闪烁着直接打击军阀政府倒行逆施的战斗锋芒。。

胡适接编的《每周评论》坚持积极推进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政治方向，并继续在全国新文化报刊中处于领军地位，自然不能为北京军阀政府所容，终于在8月30日派军警把它强行封闭。胡适毫不退缩。20多天后，胡适在上海《星期评论》上发表《乐观》一诗，诗前小序云：《每周评论》于“8月30日被封禁，国内的报纸很多替我们抱不平的，我作这首小诗谢谢他们”。诗中说《每周评论》“这棵大树”被砍倒了，但它“还有许多种子”，过了许多年“都是大树”了，对军阀政府的压迫表示了强烈抗议和极度蔑视<sup>①</sup>。

两个多月后，研究系要员蓝公武主持的北京《国民公报》遭到同样命运，胡适写了《一颗遭劫的星》表示强烈抗议。胡说在诗前序言中说：“《国民公报》响应新思潮最早，遭忌也最深。今年十一月被封，主笔孙几伊君被捕。十二月四日判决，孙君定监禁十四个月的罪。我为这事做这诗。”诗歌用象征手法描绘了这场风波：“忽然一大块乌云，/把那颗清凉光明的星围住；/那块云越积越大，/那颗星再也冲不出去！”“乌云越积越大，/遮尽了一天的明霞；/一阵风来，/拳头大的雨点淋漓打下！”但黑暗势力终未得逞，最后的胜利属于光明：“大雨过后，漫

<sup>①</sup> 胡适：《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11月增订四版第63—66页。

天的星都放光了，那颗大星欢迎着他们，大家齐说，‘世界更清凉了!’”<sup>①</sup>

研究系的北京《晨报》坚持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积极支持爱国运动，最早派记者全面报道五四爱国运动，以致极受各地读者欢迎求购，不得不登出《特别启事》，要求以原价回购5月5日、6日的报纸以满足外地读者的需求。<sup>②</sup>结果很快遭到军阀政府监视压制。5月29日起到6月30日《晨报》连续在二版头条刊登一个多月的《本报特别启事》声明：从5月23日“晚八时起，京师警察厅派员会同外右四区署员到本报馆检查稿件，所有各项新闻稿件须经审核后方准登载。在此监视状态之中，凡读者诸君极感性味、极欲闻知之言论事实，不敢保其不受限制”，本报“于消极的自由范围以内，期不失本报特色”。<sup>③</sup>这种情况，中外近现代报刊史上恐怕均为罕见。事实上，在这种压力之下，《晨报》仍继续坚持了一贯的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与积极正面报道全国爱国运动的鲜明特色。胡适在1919年12月1日在《晨报》发表《周岁——祝〈晨报〉一周年纪念》一诗，热情洋溢地说，“我祝贺你这一杯酒，/恭喜你奋斗了一年；/恭喜你战胜了病魔，恭喜你平安安全。”“我再贺你一杯酒，/祝你奋斗到底：/你要不能战胜病魔，病魔会战胜了你！”可谓褒贬适度，爱憎分明。

当然，胡适作为一个英美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自有其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性。如他从上海回到北京时，正值蔡元培离职南下，北京学生罢课高潮之际，就提出过“学生不应该罢课，我要劝他们复课”<sup>④</sup>。这当然对学生运动不利。但这其实是当时高校大多数教职员的态度，绝不等于胡适等教职员反对学生爱国斗争。如国民党人沈仲九当时指出的：“各校教职员和商店的大伙，大都不赞成罢课罢市，他们何尝不晓得救国”<sup>⑤</sup>。所以，实际上这些言论并没有发生破坏爱国运动的效果，之后因教职员越来越公开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而迅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广大爱国青年对胡适均持肯定态度。且不说罗家伦、傅斯年等终生追随胡适的一些人，就是后来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批，也在很长时期内都与胡适关系很好。恽代英1925年说：胡适“曾为一时士大夫救国者之领袖”。<sup>⑥</sup>毛泽东后来更指出，“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没有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sup>⑦</sup>，可谓道出了当时全国各地五四运动年轻积极分子们的心声。毛泽东用的“一些”、“他们”，实际是明确指出对五四运动“起领导作用的”不止

<sup>①</sup> 胡适：《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4月增订四版第72---74页。

<sup>②</sup> 《晨报》1919年5月8-----10日，原文无标点，标点为引用者所加。

<sup>③</sup> 见1919年5月23日——6月30日《晨报》二版头条（各报一版全都刊登广告）。

<sup>④</sup> 据《大公报》1951年12月16日沈尹默文；笔者1983年5月在北京拜访罗章龙先生，他也说胡适当时提出学生不应该罢课。

<sup>⑤</sup> 沈仲九：《五四运动的回顾》，《建设》1卷3期，1919年10月。

<sup>⑥</sup> 恽代英：《评醒狮派》，《中国青年》第76期。

<sup>⑦</sup>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

陈独秀一人，而主要是指北京大学的一批爱国教授；联系毛泽东其后同胡适联系频繁，请胡适给湖南自修大学起名，就湖南自治问题向胡适请教等事实，他说的这批爱国教授中包括胡适在内当毫无疑问。相反，北洋军阀和封建顽固派则对胡适却未优容，“五四”前夕，叫嚣让“伟丈夫”“足践狄莫”，把胡适踏翻在地<sup>①</sup>；“五四”后又称其为“过激党”。直至1935年，五四当年的北京医专校长、后来当了大汉奸的汤尔和还不忘胡适“在八、九年（指1919、1920年——引者）力主打破枷锁，吐弃国渣，影响所及，岂止罢课而已”<sup>②</sup>。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胡适作为亲英美派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人物，全面积极地介入了五四爱国运动，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代表李大钊、陈独秀，资产阶级民主派蔡元培、戴季陶，研究系的梁启超、张东荪一样，同为对运动发展最具影响力的重要人物。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 胡适的死

（日）目加田诚 著

石立善 译

前不久去世的胡适，在今日中国虽然是作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改良主义者、蒋政府的要人、人民的公敌而遭到了最彻底的批判，但在以前国民政府时代，他作为学者、外交官、教育行政家，是个非常华丽耀眼的人物。特别是1917年，在胡适还是一个二十六岁的留美学生时，他向祖国的杂志《新青年》投了一篇题为《文学改良芻议》的文章，引燃了中国的新口语文学运动的导火索，震惊一世。

不过，这种气运决非胡适一人的想法所引起的，而是当时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之间逐渐形成的一种强烈愿望。胡适则迅速地将这种愿望向祖国疾声呼吁，此举也可以说符合他的一贯作风。《新青年》是北京大学的陈独秀等人主办的杂志，当时正在鼓吹反儒教精神，于是就接受了胡适的呼吁，紧接着乘着所谓五四新文

<sup>①</sup> 林纾：《荆生》，《每周评论》第12号，1919年3月9日。

<sup>②</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2页。

化运动的东风，在全国掀起了新文学革命的浪潮。

大概是在昭和二（1927）、三年（1928），我还是东京大学的学生时，胡适于访美的往途或归途，顺道来东大做了一场关于中国的文学革命的讲演<sup>①</sup>。那时的胡适，留给我的印象还是一个清瘦的、白面书生型的潇洒男士。他那夹杂着手势的流利的英文，令我们听得如醉如痴。

时值昭和八（1933）、九年（1934），我在北京留学<sup>②</sup>。当时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文学学院院长，我也去听了一下他的课，记得课堂上人满为患，座无虚席，胡适在黑板上写着横排文字，讲的是《春秋左传》。

有一天，我去看胡适所藏的脂砚斋本《红楼梦》。这部写本我以前就有耳闻，它是胡适介绍公开的珍本。现在另外又发现了这种写本，而且被影印出版，所以谁都可以看到，而在当时脂砚斋本可说是梦寐以求的天下孤本。那天，我约了几个朋友同往胡府<sup>③</sup>。胡府离北大不远，是一座古旧的洋式建筑<sup>④</sup>。我们把名片通过门房递进去后，突然胡适本人跑了出来，“请请，请进”——他将我们引入会客厅，手中拿着我们的名片，暂时消失了踪影。和以前相比，胡适身上多了不少威严，略微变得稳重的圆脸上架着一副眼镜。忽然间我想起了井上正夫<sup>⑤</sup>的面容。

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胡适，拿出我们的名片，用日文念出我的名字：“メカダサン（目加田先生），是不是？”这句话令有点儿紧张的我们完全放松了下来。我提出想看看脂砚斋本《红楼梦》，胡适非常随意地就把写本拿了出来，并将关键之处一一指给我们看。

和我同去的朋友擅长英文，当他们开始用英文讲话，胡适就挺胸昂首，用讲演的腔调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席话。当我用结结巴巴的中文插话时，胡适突然变得一脸和蔼，探着身子笑眯眯地用中文回答我。而一用英文讲话，胡适就使劲儿地挺胸昂首。我颇为有趣地观察着他。我们告辞时，胡适在大门口握着我的手问道：“下次什么时候来？”

胡适一生从事了很多方面的工作，将杜威的实验主义导入中国的也是他，此外他还急进地输入欧美文化来提高中国文化。这一做法自事后而论，只能说是模仿表面上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而已。同时，胡适在中国自古以来的哲学思想以及禅学研究，还有中国文学史的实证性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多学术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中国旧小说的研究。

<sup>①</sup>胡适于1927年5月访美归途，在日本逗留了23天，期间应邀在东京大学做了一场讲演。——译者注

<sup>②</sup>目加田诚（1904—2004）以九州帝国大学助教授的身份来华留学一年半（1933年10月—1935年3月），参照《目加田诚博士略年谱》（《中国文学论集——目加田诚博士古稀纪念》卷首，东京：龙溪书舍，1974年10月）。——译者注

<sup>③</sup>据《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三卷（台北：远流出版社，1990年12月），目加田诚访问胡适是在昭和九年即1934年10月14日，和他同往的两位友人是小川环树（1910—1993，中国语学专家）、山室三良（1905—1997，中国哲学专家）。——译者注

<sup>④</sup>胡适此时寓居北平后门内米粮库4号。——译者注

<sup>⑤</sup>井上正夫（1881—1950），日本的舞台剧演员、电影演员、导演。——译者注

《红楼梦考证》及其他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旧小说的实证性研究，在胡适之前从未有人做过。今日大陆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这套书，已从第一辑出版到了第七辑<sup>①</sup>，胡适的小说研究也被批判为为了考证的考证，为了研究的研究而已。但胡适的研究成果对于现在的学者而言，肯定会有不少值得参考之处。而与此同时，也许意味着胡适的时代已宣告结束。我对于晚年的胡适，毫无兴趣。

胡适接连不断地转换研究方向，他一提倡某种研究，人们就会哗地一拥而上，冲向那个问题，而当世间议论沸腾之时，他已经转向了下一个问题。他的著作一出上卷，立刻风靡一世，但之后他却绝不再续写了。无论是《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是《白话文学史》，都是如此。

据说胡适的夫人虽然聪明，却完全是个乡下人，胡适教她识字，循循善诱，使她变成了一个高雅的妇女。这对和睦的夫妇，在大家的结婚仪式上是不可或缺的上宾。在欧美人的宴会上，胡适作为中国方面的名士也是不可不到的代表，所以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有一份杂志评论道：胡适白天上课、做讲演，在家则来客满堂，座中有学者，有政治家，还有乞丐，夜晚则赶赴名士的宴会，然后归宅。我只记得文章中的最后一句话——“半夜挑灯，作上卷书。”

**译者后记：**本文译自目加田诚《胡适の死》（《文艺春秋》1962年5月号，东京：文艺春秋新社，第53—54页）。此文后被收入《洛神の赋——中国文学论文と随笔》（东京：武藏野书院，第253—256页，1966年11月）、《目加田诚著作集》第八卷《中国文学随想集》（第81—84页，1986年9月）。目加田诚是日本的中国文学家，大部分著作均收入八卷本《目加田诚著作集》（东京：龙溪书舍，1981年6月—1986年9月）。

（译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

<sup>①</sup>《胡适思想批判》共出版了八辑（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1月—1956年4月）。——译者注

# 犹太神学院院长与胡适

陈毓贤

我和周质平教授合作用英文撰写胡适与韦莲司的恋情出书后，<sup>①</sup> 收到纽约大学Ernest Davis 欧内斯特·戴维斯教授的来邮，他的专业是电脑，但对我们的书特别有兴趣，说与胡适相晤是他外祖父Louis Finkelstein 路易·芬克勒思丁纳一生最快乐的一天。

芬克勒思丁纳（1895-1991）自 1918 年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后，便在处于纽约市的犹太神学院执教，从 1940 年至 1972 年是该院的院长，著作斐然，是在美国的犹太教居于正统派(orthodox)和革新派(reform)之间的保守派(conservative)中很具影响力的思想家。

下面这篇文章一名叫Hilde Lewis 的妇人 1986 年写的，戴维斯教授注入适当的日期，把它录在纪念他外祖的网站上。<sup>②</sup> 以下我把它译成中文：

## 路易·芬克勒思丁纳和胡适

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住在犹太神学院院长芬克勒思丁纳教授家，替他打理家务兼照顾孩子。那天吃过晚饭，孩子们已经离开餐桌，我突然向芬克勒思丁纳教授问道：“您平生最高兴的事是什么呢？”我正选修一门心理学课，引发我提这问题。

身材修长，气度俨然的芬克勒思丁纳教授留了一把黑胡子，眼神相当忧郁，他望着我一笑说：这问题我答得了，那是 1941 年的事，我们的跨宗教研究所要找人作隆重的讲演，我想到胡适，因我看过他的著作，知道他是一流学者，便致函到中国大使馆请求谒见，回函出奇的热请，让我对中国人办事的作风有点惊异。

我乘火车到华盛顿后，搭计程车到大使馆，被请入大使的书房接见，他走进来是这样跟我打招呼的：“芬克勒思丁纳教授，我听说我要担任大使时，心中最希望能见到的人就是你！请坐！请坐！”两人坐定，我四处望望，看书房布置得很典雅，到处是古董，画轴，精致的地毯，胡适则弯腰把小儿子上的两部书提起，对我说：“你告诉我来因之前，能否先在你写的法利赛人的著作上签个名，我将非常荣幸。”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在这充满异国情调的屋子里，按法律说还是异国土地，居然有两部我 1938 年出版关于犹太法利赛人的书。我把书捧过来，发现都被细读翻旧了，并有不少眉批，激动得要写献词一时忘记他的名字是胡适。

<sup>①</sup> Susan Chan Egan and Chih-p'ing Chou, *A Pragmatist and His Free Spirit: The Half-Century Romance of Hu Shi and Edith Clifford Williams* (香港中文大学, 2009)。

<sup>②</sup> <http://www.cs.nyu.edu/faculty/davise/personal/lf/lf.html>



大使把书接回说：“让我告诉你我是怎样拥有这两本书的。几年前我在研究中国一个古老的部族，这部族没落分散了后备受人歧视，却仍数百年维持其独特的文化，我写信到美国国会图书馆，问世界历史上有没有相似的案例，他们推荐我看你的书。你瞧，果然从头到尾看了又看了。我到华盛顿后，一直想找机会和你见面，收到你的信，竟感到也许冥冥中有神灵安排。”

“你现在可明白为什么这是我平生最高兴的事了。我的书居然获得地球另一边一位如此学问渊博的人欣赏，实在让我太激动，太快乐了。况且，胡适的演讲果然很出色！”

胡适在《说儒》内推测“儒”本来是殷商遗民，像犹太人中的法利赛人，成为世袭专司礼仪的族裔，他1941年到犹太神学院讲演，就用这题目，此讲稿收入周质平编的《胡适未刊英文遗稿》内。<sup>①</sup>胡适当时承认他的看法没获得林志钧、冯友兰和顾颉刚的接受，但一些老辈学者如陈垣、高梦旦、张元济，倒热心赞同这论说。胡适形容他写这篇文章时兴致很高，常一边写，一边独笑。<sup>②</sup>无论如何，从芬克勒思丁纳的回忆中，我们可窥见胡适思想领域之辽阔，也间接感受到胡适的个人魅力，让这位犹太思想家，把他与胡适短暂的交流，视为他一生的高潮。

## 胡适与西安有关联的一件事

苏育生

最近读胡适书信，发现他与西安有关联的一件事，就是西安图书馆藏的一部《水经注疏证》的书。

北魏酈道元的《水经注》，是古代地理的一部经典著作，历代研究者甚多。到了有清一代，著名学者如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等，经过对以前各种版本的精心校勘和研究，完成了《水经注》较完善的版本。但从张穆、魏源、杨守敬以来，对戴震产生了质疑，认为他曾看过赵一清的《水经注》本子，因“其书未刻”，经过“润饰以为己有”，由此“戴窃赵”的《水经注》成为一桩历史公案。到了民初，经过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孟森进一步研究考证，认定“赵东潜（即赵一清）

<sup>①</sup>（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270-285。

<sup>②</sup>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6：424-425。

作《水经注释》全部为戴东原（即戴震）所窃”，似乎完全坐实了这一所谓“剽窃”案。

胡适自从卸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职务后，在美国，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开始了关于《水经注》的研究，一头钻进去，几乎占去了他晚年大半多的时间。他重新审视《水经注》案，始于1943年底。这年11月8日，他给朋友（时任纽约国立图书馆长）王重民写信说：

我一生不曾读过《水经注》，偶尔检查则有之，但不曾读过全书。因此我对于戴、赵、全诸家校本案，始终不曾发一言。

前几年，当孟心史（即孟森）的文章发表后，我曾重读静安先生（即王国维——引者）的《戴校水经注跋》。那时我觉得此案太离奇，多不近情理之处，其中也许有别情，为考据家所忽略……

我久想将来搜集此案全卷，再做一次审问，以释我心中的疑惑。我并不想为戴氏洗冤，我只想摆脱一切成见，以求满足我自己“求真”与“求公道”的标准。

此后，胡适为了重审这桩公案，他对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的《水经注》文本，下笨功夫进行校勘考证，终于初步弄清了事实真相，为戴震洗刷了几百年来所蒙受的冤枉。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为考证《水经注》疑案，“足足费了我七个月的笨功夫，往往废寝忘食，夜间做工到天亮。”从此胡适一发而不可收，广泛搜求《水经注》的各种版本多达二十多种，经过多年的校勘、考证和研究，写了关于《水经注》的大量书信、札记、题跋和文稿。他初步审查的结果，认为赵一清与戴震都是各自完成了对《水经注》的校勘和改定，不存在相互抄袭的问题，也不存在赵和戴共同抄袭全祖望的问题。赵一清和戴震的大贡献有两点，第一是他们都考定了数百年来互相淆乱的经文和注文；第二是他们都做了无数数字的校改。尽管他们在考定经文和注文中，有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相同性，这全靠各自推理的校勘，属于“独立而同归”，并不能证明彼此相抄袭。特别在校改《水经注》的字句讹误方面，因没有古本或古书做依据，更显示出赵、戴两本很大的差异来了。至于参与这桩公案的学者，往往越辩越糊涂，关键在于：一是全案的材料太多，没有细心研究；二是对涉及的证据与事实，缺乏严密的考证；更重要的是，他们大都带有一种成见，要替赵一清打抱不平，即使像王国维、孟森这样的大学者也在所难免。

1946年7月，胡适回国，担任北大校长。此后随着时局的发展，平津战役打响，人民解放军已逼近北平；加之社会秩序混乱，各校学潮连绵不断，北大已

不是过去书声琅琅的校园了。胡适在应对校内外繁难的诸事之余，还没有忘却对《水经注》研究的兴趣。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的五十周年纪念日，胡适还特别安排了一个关于《水经注》版本的展览。就在举办这个展览的一个月前，胡适意外地收到了西北大学校长杨克强的一封信，说在西安图书馆发现了一部《水经注疏证》。这一发现，对于胡适来说是一极大的“喜信”，就在收到信的当日，即11月26日，他即刻给远在上海的顾廷龙写信报告了这件事。他说：

今天有绝妙的喜信报告你……万想不到《水经注疏证》稿本（或抄本）竟会在西安的国立西北大学发现！写信的人是校长杨克强先生。他是北大毕业的有名地质学者，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我已复信，请杨君1、将此八册寄给我，为北大五十周年纪念日“《水经注》版本展览”之一，展览毕，即借抄一部，我当为西北大学本写一跋，然后寄还。2、如航寄上海为更方便，则请他直寄合众图书馆，由你收下，借抄一本，然后寄还。3、如当此乱世，不便寄借，则请杨君为我雇几个抄手分抄八册，抄费由我担负。

信刚寄出，第二天，即11月28日，胡适又给顾廷龙写一信，说：昨寄一“喜信”，报告沈钦韩《水经注疏证》稿本，已在西安发见了卅十五卷。想此信又达览了。我近来到处宣传我正治《水经注》，其用意正欲使各地的《水经注》都出现耳。为此一事，即可见我的宣传确有用处。他还无可奈何地说：“在此天翻地覆中作此种故纸堆生活，可笑之至！”

胡适为什么要在第一时间写信给顾廷龙呢？

顾廷龙（1904—1998年）字起潜，苏州人，是很有学问的版本学家。他于三十年代初毕业于特志大学国文系，获燕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与老一辈学人张元济、叶揆初等合作创办上海合众图书馆，并任总干事。他是顾颉刚的长辈，胡适就是因此而认识他的，他们之间也有书信往来。据胡适五十年代回忆，在1947至48年之间，他与顾颉刚有一次同在上海，他们和顾廷龙还在一起吃过饭。（1955年12月29日胡适致杨联昇信）此次胡适写信给顾廷龙的起因，是因为上海合众图书馆藏有三种《水经注》版本，即全祖望重校《水经注》残抄本、黄友录本、陈励录本，顾廷龙于1948年10月下旬写信，请胡适为这三部书写跋，并托胡适询问沈钦韩《水经注疏证》稿本的下落。于是，胡适在“连日为教员罢教事奔忙”之余，到中央研究院傅源叔老先生家中看他，问起《水经注疏证》稿本的情况。他说，当年在扬州买到这部书，后来让给别人，已记不起让给谁了，他自己也没有抄有副本。11月4日，胡适写信给顾廷龙，将此情况详细告诉他，

还特别说了一句：“此话定使吾兄失望”。正是在此背景下，当他看到杨克强的信后，就把这个意外的喜讯及时报告给顾廷龙。

给胡适写信的杨克强，时任西北大学校长。他名杨钟健（1897—1979年），字克强，陕西华县人，地质学家，我国古脊椎动物学奠基人。1923年毕业于北大地质系，后赴德国慕尼黑大学，学习古脊椎动物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北平担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主任，以及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重庆大学、西北大学教授。1948年4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这年年底被任命为西大校长，兼任西安国立西安图书馆筹备委员会主任。当他得知北大五十周年校庆要搞《水经注》版本展览，就给胡适写信报告了这一信息。他接到胡适的信，经与同人商量，然后回信说：“同人商讨结果，为万全计，现由此间抄一份，俟抄竣后，或将原本奉上，或为抄本奉上，均无不可。”胡适也考虑到应以安全为重，后来又去一电云：“乞抄副本见寄，抄费由适担负”。最后杨克强决定，先将《水经注疏证》的序文及卷首页照片，寄给胡适作为展览之用，然后组织人力赶抄副本。这件事，北平《世界日报》在12月11日登出消息，标题是黑体大字：“胡适闻之喜”，副题为：“西安图书馆发现《水经注疏证》善本”，其内容是这样的：

**西安图书馆发现沈钦韩著《水经注疏证》善本，西大杨钟健校长电告胡适，胡适闻讯大喜，杨氏已将序文及卷首摄影寄胡，参加北大五十年纪念《水经注》展览之用，并赶抄原书八本，此书系西安图书馆接受南京无主图书中发现。**

12月13日，胡适又给顾廷龙写信，报告以上情况，并将《世界日报》的报道剪下随信寄去。还告诉他，此消息见报后，北大教授王利器特地对他说，1936年上海《艺文》杂志曾分两次刊登了《水经注疏证》的序，目录，及卷一、二、三、四、五，并未登完。胡适希望顾廷龙能询问此稿的来源及有关情况，弄清它的来龙去脉。

胡适五年来研究考证《水经注》，自己收集有二十多种版本，看到的多达三十多种，为什么对《水经注疏证》如此感兴趣呢？除去这是他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新的《水经注》版本，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与他读过沈钦韩的其它著作有一定关系。胡适在美国研究两汉思想史时，曾向王重民写信借阅有关书籍，其中就有沈钦韩的两部书，一部是《汉书疏证》，一部是《后汉书疏证》，他对这个人的学问还是了解的。沈钦韩（1775—1831年）字文起，嘉庆十二年举人，授安徽宁国县训导。他有个人诗文集，特别长于训诂考证，除《两汉书疏证》《左传补注》

外，还为韩昌黎、王荆公诗文集做过补注。在顾廷龙托胡适询问《水经注疏证》前，他还不知道沈钦韩有这部著作。因此，当他知道西安图书馆存有《水经注疏证》，就急于先睹为快，并准备写一跋以记其事。

但此时局势的发展，远在胡适的意料之外。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平津战役中节节胜利，北平已危在旦夕。1948年11月底，南京政府议决所谓“平津学术教育界抢救计划”，命北平的著名教授学者南下。胡适因忙于筹备北大50周年纪念活动，迟迟不肯起身。12月12日，南京教育部长朱家骅电报催促胡适来京。12月15日，蒋介石亲自下达手谕，派飞机接胡适南下。这时他决定离开北平，无暇再顾及北大校庆和《水经注》展览，当天便飞往南京。

因此，当胡适看到西安图书馆寄来的《水经注疏证》手抄本时，他已在南京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了。胡适还是给西北大学杨钟健校长写了回信，表示感谢。他匆匆看过《水经注疏证》后，已无有心情写跋了，遂将手抄本寄给上海的顾廷龙。12月29日，他给顾廷龙写信说：“附上西安图书馆寄来沈文起《水经注疏证》三十五卷，八册。我匆匆看过，偶有校正，但客中无书，竟不能作跋。”他不无伤感地说：“我在南京两周，不能有平心论学的心境，甚愧。”他还特别提出，抄费原应由他自己担负，但考虑到他目前的处境，建议如能由上海方面负担，这部抄本也就归上海合众图书馆所有。后来顾廷龙同意抄费由上海担负，直接寄给西安图书馆。几天之后，即第二年1月3日，胡适回信说：“沈文起《水经注疏证》抄费承贵馆担负，十分感谢。下次我来上海，也许能写一短跋。”

胡适自知道西安图书馆藏有《水经注疏证》，短短一个多月内，他从开始闻之“大喜”，准备写跋以记其事；及至接到手抄本后“匆匆看过”，不及写跋立即寄给上海收藏，从这里也反映了胡适当时的苦涩心境。虽然他一再说他会来上海，还可以写一短跋，但在他于1949年4月离开大陆后，虽然还没有中断《水经注》的研究，但再也没有给《水经注疏证》补写短跋了。

（作者单位 西安市文化局）

# 胡适的最后一篇日记

段怀清

—

在曹伯言先生整理的《胡适日记全编》中，胡适的日记终止于1962年2月21日。三天之后，胡适因心脏病突发不治去世。也因此，2月21日的日记，就成了胡适坚持了一辈子的日记之“绝篇”。这一篇日记，或许与胡适其他日记相比，并没有太多“特别”之处，尤其是在有些人看来，老年的胡适，思想已渐趋“平庸”，学术与思想的生产力，也已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所以，胡适临终前的日记，除了对于了解胡适完整的生平之意义外，对于胡适之学术与思想研究，意义并不大。

真实的情况是否如此？胡适在他生命终止之前还在关注什么？思考什么？这些关注与思考，对于胡适有什么特殊意义？对于胡适研究有什么特殊意义？对于胡适一生所关注的中国思想的发展又有什么特殊意义？甚至，对于中国社会的进一步现代化与自由民主化，又有什么特殊意义？

当然，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我们需要弄明白的是，胡适这一天的日记中究竟记载了些什么。

胡适1962年2月份日记一共只记录了六天，即2月4日、5日、9日、10日、19日和21日。惟如此，似更凸显每日日记，对于胡适个人之意义在——细查这几日日记，尽管依然不乏一般意义上的迎来送往之记载，但更多所记，却是胡适此时每天仍在关注思考的东西。而21日的日记，即为一明证。

21日日记全篇不到百字，然后是一张剪报。日记全部内容如下：

在《民主潮》十二卷第三、四期上，看见一篇《论思想或观念的僵窒和简化》，是一篇很用功思想，很用气力造句作文，全文无一句草率句子的好文字。作者自署“韵笙”，不知是谁。我写信问编者夏涛声君，他今天回信说，此人是徐传礼，政大研究所毕业，现在国立编译馆工作，兼新闻学校工课。

政大（所谓“政治大学”）居然能出这样一个人才！真使我惊异。

其实，胡适的惊异并非仅此一日。前一天，也就是19日日记中，胡适已经记录了读到这篇文字时候的心得体会，不过是通过一篇书信的方式完成的：

涛声兄：

昨夜读了《民主潮》十二卷三、四期的韵笙《论思想或观念的僵窒和简化》，我很佩服作者的细心和苦心。这是近年来很少见的一篇用功构思，用气力作文造句，全篇没有一句草率句子的大文字。

请你告诉我这位“韵笙”先生是谁？我很想见见他，很想向他表示我的诚心佩服。我猜想，因为他的造句太用气力，又颇太欧化了，能读此文而欣赏他的人大概不太多。所以我要写这封信，表示我的一点欣赏。

……

从时间上看，胡适的这“一点欣赏”，至少延续了三天，也就是2月18日夜——这是他初读此文并被感动、萌发弄清楚文章作者或见见作者念头的时刻；2月19日——这天胡适特意写信给《民主潮》编者夏涛声，打听该文作者，并表达自己对于此文之“佩服”“欣赏”；2月21日，可能感到意犹未尽的胡适，此日日记中干脆全记录与此文、此事相关之信息，让胡适日记的读者们不会感到奇怪的是，胡适还将这篇让他触动甚至激动了三天的“近来很少见”的文章，剪贴在了他的日记中。

尤其是，在19日日记中，胡适还特别在“近来很少见”一句中的“很少见”三字下面加注点强调。不仅如此，或许是对此文爱之过切，胡适不惜越俎代庖，直接在剪报上将此文标题简化为“论思想的僵化”。

已过从心所欲之年却被认为思想的活力已大大衰颓的胡适，临终前三天却是在对一篇论述“思想之僵化”的文章大加赞赏。这不能不让人在喟叹之余亦生疑问：胡适晚年的思想活力，真如某些人所言那样“衰颓”了吗？

要想弄清楚这一点，或许可以从这篇为胡适所激赏的文章中找到一些思想线索。

## 二

至少在胡适这里，无论是弄清楚这篇文章的作者之前和之后，“韵笙”和“徐传礼”都是一个无名小辈。但这显然并没有影响到胡适对于这篇文章之立意思想乃至遣词造句的极为欣赏。原因并不在于作者的出身背景（“政治大学”），与这种独立自由思想言论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反差，而是这篇文章的思想，与台湾当时的政治及思想言论环境，与五四以来围绕着“古今中外”思想所展开的种种言论纠缠，与胡适自己一生所奉行之言论理想之间所形成的高度关联性——在胡适日记中，你甚至可以感觉到，胡适几乎是要压抑着自己才没有道明一句话：这就是我播下的思想种子！

而稍微熟悉一点胡适言论的读者都会注意到，就在几年前，殷海光曾称赞胡适的《容忍与自由》一文，为“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上的一个伟大的文献”。而胡适此时称赞《论思想或观念的僵窒和简化》一文为“近年很少见”，其中“近年”，不妨理解为三年前（1959年）胡适的《容忍与自由》一文刊发以来。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找到了胡适对于此文如此感慨，又如此关注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

关于《容忍与自由》，我已有一文专门讨论过（即《胡适和他的〈容忍与自由〉》，刊《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19期），此不赘言。这里想探讨一下的，是《论思想或观念的僵窒和简化》一文，究竟怎样坚持并发展了胡适在《容忍与自由》中所表达的思想言论，或者，又是怎样有力地呼应了胡适一贯追求并坚持的思想主张。

其实，《论思想或观念的僵窒和简化》一文的立论基础并不复杂深奥，一如胡适一贯的言论思想——“人类之所以能够从自然状态，进入他们自己所创造的文化生活，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思想或观念的形成和应用。……但是不幸得很，在某一些情况之下，当大多数的思想或观念模式发展到某一种阶段的时候，它们反而相反地变成了它们自身发展的严重阻碍。这是说，它们在它们自身的形式条件的限制下僵窒了，甚至倒退了”。

文章接下来“奇怪”而“大胆”地引用了恩格斯、马克思分别论述德国人的国家意识（或迷信崇拜）与法国人的个人英雄迷信崇拜的两段批评。而引用及相应分析只在说明，“思想或观念何以会和它们的原始的理想目的两相悖离，以及它们何以会对于我们个人、或许许许多多个人之心智，造成了那样的与其目的两相悖离的种种倾向的理由”。

对于人类思想或观念历史上的这种思想与观念的“自我异化”现象，该文并没有给予过多关注，它所真正关注的，是思想或观念领域里的一个时常发生却又很容易被忽略或者迷惑的现实困境，也就是上面所提出的那一疑问，换言之，该文章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思想或观念何以会僵窒和简化？如何克服思想或观念中的这种僵窒和简化？

思想或观念的僵窒和简化，当然与所谓的“先入之见”有关，即所谓“先入为主”。而这里所谓的“先入之见”，可以是先入之思想或观念，而这些先入的思想或观念，因为人类思想或观念的习性使然，极容易使之成为一种具有自我保护和自我排斥的双重思想或观念习性：对先入思想或观念的保持，以及对后入思想或观念的自动的、习惯性的排斥。用文章作者的话说：

这种习性不但在消极方面有阻塞我们的思想或观念走向新真理之路的危险，并且还在积极方面把我们的实际生活推进了一个极其有害的陷阱之中。它使我们



不自觉地站在一个特殊的立场，来判断一切的是否和问题，而这个立场又完全是以我们自己的生活状态，亦即我们自己的环境、自己的宗教、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我们自己的道德意识、或利害关系作出发点的。

这是胡适所熟悉并经常使用的一种分析语言。胡适式的“问题意识”或者“怀疑”“批判”意识，都是与对于上述“先入之见”的破除为对象的。甚至可以说，胡适式的实验主义思想的核心，其实就是对于传统文化思想中的思想者对于思想对象之“主敬”的主观先入态度或意识的批判。在胡适看来，这种外源性的思想约束，在长时间的思想进程中，会逐渐转换成为思想者的一种不自觉的潜意识，并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约束思想者自由思想的内源性“自觉”——这种自我习性化了的思维方式与思想处境，正是胡适面对中国思想与文化的现代处境时提出“大胆假设”的现实引发之一，用胡适的语言，破解上述思想之魔咒者，惟有“历史的眼光”和“进化的观念”。

而《论思想或观念的僵窒和简化》这篇文章之所以引发胡适如此感慨与关注，并非在于它提出了什么新的思想观点，而是在于它几乎将胡适坚持奉行一生的思想主张，在一个更为现实且富有针对意义的时代语境中，用一种从容不迫的态度和理性而严谨的分析而娓娓道来。在胡适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一个思想的奇迹，一个时代的奇迹，一个 20 世纪中国思想的现代意识逐渐明晰与确定的奇迹。

它说：“这种思想或观念，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但较概括地把它叫做自我中心的，或自尊的本位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差不多在行将形成，与已经形成的思想或观念体系的发展过程中，是很容易和愿意、或被动地接受了某种思想或观念体系以后的大多数人的思想或观念习性十分接近的；以致最后它就变成了、或根本就相等了那些人们的思想或观念”。

它又说：“结果，这种习性一方面制服了人们应有的反抗，它方面也冻结了思想或观念本身的活动能力”。

它又说：“大多数具有‘绝对’意识、或‘唯一’意识的思想或观念体系就是这样，它们一经创立，就会建造起它们自己的定式和风格，和得到它们自己的生命。……在这种思想模式已经成为‘经典’的空间里面，只需要‘希特拉这样说’、或‘资本论这样写’一类的言辞，就可以把自己所面临的敌人给整个地解决掉。……因此，在这样的教条领域里面，一切的事实，也只有明白地宣告回避”。

它还说：“究竟这算是什么呢？这是一种倾向，尤其是现代极权主义思想或观念体系所共有的一种倾向，一种把自己的思想或观念体系看作是真理化身的倾向。这种体系的信仰者们，有意地把自己的一种特定的思想或观念，简化为一个具体而无所不包的学说，和把这种学说简化为一、两个单纯的公式，然后自己就

躲在这种公式的架构里面，来创造他们自己所想象着的世界。因此，他们就不能不打击一切不属于他们自己圈子里面的思想或观念体系。

.....

制造和发展这种思想或观念体系的人，原来是想带来一个千年福（Millennium）的，结果他们反而以另一个最愚蠢的错误，来代替了原来的那个愚蠢的错误”。

### 三

《论思想或观念的僵窒和简化》一文对于人的这种所谓“习性”的发现与探讨，并没有停滞于一般意义上，而是进一步考究“习性保守”又是怎样与“制度惰性”结合在一起的，并由此考察制度之所以成立，之所以能够被认同接受的集体潜意识——一种被“先入之见”所造就的集体无意识或潜意识。而无论是思想还是制度，大抵都会经历从最初的活力，到后来的“锐气丧失”这样一个时间法则或自然法则。最初的思想信仰与制度信仰，或许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思想与制度的现实效能，而当思想与制度的活力转入衰颓时，维持对于思想和制度的信仰，却无疑会阻碍新的思想与制度创新——“人创造了制度，可是不适用的制度，及其僵窒了的惰性，却促使了人思想或观念的简化”。

如果说上述分析还稍显抽象，那胡适对于此文中如下这样的论述一定感到欣慰：

任何对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因素的绝对性的一元理论，都有一种倾向，就是拿现成的答案来解释所面临着的问题。这种答案的笼统性质，不但使在实际问题中，精密地考察和鉴别它的特殊事实为不可能，并且还使得它的活力带来了种种的新困难。

这种在思想领域与现实生活中极容易出现的“公式主义”和“机械教条主义”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在此文作者看来，“是由于这种思想或制度，在性质上，包含着一种简化的因素，或其信仰者把这种因素再极端地简化为若干方便公式的缘故”。而无论是这种“简化”方式本身，还是被简化成为“公式”了的思想或制度，都已经“没有能力去处理新生的事物或变化”。

这时候，原来的信仰者又去依靠什么，来应对新生的事物或变化？

这是信仰的鼓动者、作为信仰的对象以及信仰者在信仰本身被摧毁之前都不愿意也不可能去面对的一种处境，因为它是一种思想自我或信仰自我面临崩溃的艰难困境。而在胡适看来，真正的思想，不是从信仰开始的，亦不是到信仰结束，而是从怀疑开始，并在怀疑中一点点接近真理本身。“信仰可被应用为获致成功

的内心努力的保证，但不是说明事物和问题的健全知识。因此怀疑和新生体系的创造，就成为必要之事”。

不妨再来看看这篇长文在经过古今中外诸多经验材料的分析阐明之后所得出的结论：

总而言之，期待一个固定的教条，一个不变的思想或观念体系能够永远的有效，是不合理的；同时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一种有效思想方式的出现，就只有期待与教条相反的，亦即自由的研究精神。自由的，或名之为科学和民主态度的思想方式，要人相信的，不是它自己的独一无二，而是客观的证据；而这种代替死硬教条为信仰基础的客观证据，才真正是人类接近真理殿堂的有效途径之一。

这几乎就是对胡适留学归国之后所有思想与学术努力的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当代辩护。更关键的是，这种论述在倡导并呼吁思想者的独立与自由的同时，亦在呼吁建立一个“具有开放心灵的个人，和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一个有能力去自由开放地思想的健康个人，同时，这样富有个性与创造的思想，又能够得到一个自由开放社会的尊重与保护。

#### 四

其实，可以说胡适对于这篇文章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读”。最为明显的一点，那就是这篇文章是有具体的批判对象的——当时正在极端化的斯大林主义及其在各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蔓延（这一点也可以从为什么此文作者的教育出身是让胡适感到惊奇的“政治大学”这一点上显示出来）。但胡适有意无意之间，将这篇文章的具体批判对象抹去了，而让它具有了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反思想僵化、反思想威权和反思想专制的思想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亦将这篇文章，与胡适自己一生对于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本本主义、机械公式主义等的思想批判努力关联起来，一方面借此再次强调了自己终身追求奉行之思想，另一方面，亦借此完成了最后一次对于当权者的告戒与警示。只是，这样的告戒与警示，在胡适最有思想影响力与言论力的时候亦不曾真正产生过实际的效用，在他成为了权力礼仪场中一个其实早已被“偶像化”和“仪式化”的象征符号的处境之下，在胡适自己的生命也已经走到其尽头的时候，又指望能传达到何处呢？

无论如何，胡适还是通过这则日记，将他思想生命的最后形象，定格在了一个反思想僵窒、倡导思想解放和自由的开道人之上。

这也是一个永恒的思想生命的形象定格。

2010年6月30日沪上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 《胡适研究通讯》征稿启事

为了推动胡适研究，保持和加强胡适研究会会员和关心胡适研究活动的朋友之间的联系，胡适研究会将于 2008 年开始，刊印《胡适研究通讯》。

《胡适研究通讯》的内容主要是：汇录海内外胡适研究的各种信息；刊登胡适研究短论、书评；刊登胡适的未刊文献；登载重要著作、文章的内容摘要；报道胡适研究会的工作等等。热诚欢迎胡适研究会会员和海内外热心胡学的朋友们踊跃赐稿。

《胡适研究通讯》每年编印四期，每期 3—5 万字，将于每季度的第二个月（即每年的 2、5、8、11 月）印行。

《胡适研究通讯》为仅供学会会员阅看的非卖品，系内部印刷物，不公开出版、发行。每期印制 200 份左右。

因我们财力有限，因而凡被《胡适研究通讯》采用的稿件，一律不付稿酬。但作者可将其文稿再投给其他报刊。

《胡适研究通讯》由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先生负完全责任，由宋广波负责征稿、编辑、印制及邮寄等事宜。

《胡适研究通讯》是专门为有兴趣做胡适研究的朋友们创办的一个学术园地。我们相信这是大家所共同期盼的，能够得到大家的爱护和支持。

联系人宋广波通讯方式：

北京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宋广波收（邮编 100006）；

电子信箱：hushi911217@126.com

胡适研究会 2007，11，24

本《通讯》承蒙陈宏正先生予以资助，谨此致谢。